# 清代滇桂地区开发概论

潘向明

清代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使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由事物总是不断地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它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和开发方面也同样如此，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和广西在这方面所造就的业绩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在前此历代基础上对滇桂地区的开发及其成绩，不仅使国家的统一和西南边疆的稳固程度较之前代得到显著的深化和加强，也使这里昔日极度落后的广大边远山区的社会经济面貌获得相当程度的改观。

## （一）

滇桂地区的自然地理位置是在青藏高原剧烈下沉和云贵高原及其向沿海平原的过渡地带上，其地势的大致走向是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地形复杂，山地众多，是这一地区的显著特色。其中，云南除滇池、洱海附近以外的广大周边地区，四处丛山密布，峡谷纵横，农业生产颇受局限，交通状况也十分不便。广西西部和西北部山区的农业和交通条件与云南相似，而桂东和桂东南一带则因地近沿海而具有相当优越的农业和交通上的自然条件。众所周知，清代广西东部及东南部是当时我国南方具有发达的粮食生产能力的地区，并且也是极富舟楫之利的交通便利地方所在。本文所论清代滇桂地区的开发问题，主要针对云南周边和广西西部这些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导致前此历代开发水平十分低下地区在清代的开发问题进行论述，而不以云南的滇池、洱海附近地带和广西的东部、东南部这些所谓“腹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后者因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早在清代以前已经达到“几与内地相埒”的开发程度，它们在清代主要是继续发展，而非“开发”问题。

自秦汉以下，滇桂地区逐渐获得由浅入深的开发。从楚将庄跻开滇、秦皇凿灵渠时起，内地汉族人民便不断地迁徙流入这里，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共同从事着这两个边疆省区的开发活动，迄至明末清初，这里的上述所谓腹里地带，已在许多方面同内地各省相差无几。因此，以发达的腹里地带控制落后的边远山区，便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在政治上对这里施行统治的必然途径，正像清初学者毛奇龄所说：“版籍其地、加以经划，创置云南、楚雄、临安、大理诸府为内地，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东里诸地为西南夷，“如旧时成都之视滇池。”① 这样的腹里地带便成为清代继续对边远山区作进一步开发的基地。

我们知道，生态环境和由此决定的人口密度，对地区经济的开发水平有着重要影响。生态环境，首先是农业生态，往往直接影响地区人口密度，进而决定着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这一点在封建生产力条件下的边疆民族地区尤为明显。滇桂二省的边远山区之所以在清代以前仍处于开发水平极其低下状态，主要原因是这里的农业生态环境不及腹里地带，导致人口

稀疏，缺乏足够的社会生产力的缘故。而当地社会经济的这种落后性，又使其政治形态相应处于低下层次，具体表现便是大小土司各自为政，形成一个个封闭的“独立王国”，作为割据势力阻碍着内地人口的流入，这种情况又反过来加重了当地由于自然环境造成的闭塞落后程度。

清代康熙中叶以后，“海内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内地各省多有人满之患，出现大量剩余人口，于是纷纷涌入边疆地区以谋求生计。就滇、桂所在西南边疆而言，其传统开发区的腹里地带，容纳内地移民的能力已十分有限，因此广大的边远山区便成为移民们的必然归宿，致使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迅速增加，从而改变当地原有的闭塞和落后状态。但是，如果这时的西南边疆仍像清初及其以前那样，政治上土司林立，各据山头，以至有“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的事情②，那么内地人口向边远山区的流动必将因此而受到严重阻碍，这些地区也就无从提高其开发水平。雍正年间以滇桂二省为主的西南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运动，则恰好起到扫除这种人为障碍，为内地人口大量流入边远山区从事开发活动创造了前提条件的历史作用。

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时代，边疆地区政治建制的统一性及其深刻程度，是封建王朝对这些地区统治强度的标志，同时也是衡量该地区社会经济开发水平的尺度之一。政治建制的形式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来决定。清代以前滇桂边远山区的土司制度有其所以存在的合理性，清代雍正间的改土归流亦非完全革除土司制度，譬如当时云南的改流方针是所谓“江内宜流不宜土，江外宜土不宜流”，其原因皆在于政治建制的形式需要根据当地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交通条件来进行因地制宜的处理。但是，政治建制的改变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推动和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这是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特别是在清代前期国家统一和边疆开发的历史趋势之下，这种反作用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雍正间西南地区的大规模改土归流，使滇桂边远山区的政治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便是在府一级建置层次全部流官化，譬如在广西西部改泗城、镇安二土府为流府，在滇西北改流丽江土府军；更于旧有府辖地面过于阔大之区增设新的流官府治，如在滇南设普洱府，在滇东北设昭通府等。其结果既消除掉较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府级以下间或存在小的土司政权，如州、县、峒、寨之类土司，但全都隶于府级政权管理之下，已不存在势力强大的土司政权——从而使国家的统一更加深刻和完整，又使内地各省及滇桂腹里地带的众多剩余人口得以自行涌入这些地方，从事垦植、采矿和经商等开发活动。所以，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不但在清代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清代西南边疆开发史上一件有着深远影响的事件。它标志着这一边疆地区的开发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乾嘉年间滇桂边远山区社会经济方面的全部开发业绩，都与此密切相关，从而造就清代西南边疆开发史上的这一“黄金时代”。

## （二）

顺治年间和康熙二十年以前，清朝统治者在西南地区先后进行了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斗争和平定“三藩之乱”的长时期战争，滇桂二省首当其冲。接连不断的兵燹战乱，使原来发达的腹里地带也陷于一派凋敝残破景象，更谈不上边远山区的经营开发。因此，清代滇桂地区的开发历史只能是从康熙二十年（1681）以后始经开其端绪。但从这时起到康熙末年一段时间，仍主要是腹里地带的原有社会经济面貌的恢复，尚且没有边远山区的经营开发可言，至多

仅有数量和规模都很小的采矿事迹而已，在当时滇桂二省的整个社会生产活动中明显居于次要地位。只是雍正年间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伴随着全国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和内地大批剩余人口向边疆地区移动之历史潮流的到来，二省边远山区的开发才正式进入其发展阶段，至乾隆中叶达于鼎盛，而于嘉庆末年和道光年间趋向衰落。这一阶段长达百年之久，清代滇桂地区的开发成就主要是在此期内所取得的。

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清代滇桂二省边远地方的开发，是同乾隆初年以后这里迅速增加的人口数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所知道，人口因素具有生产和消费的二重性，问题在于一定社会生产力的需求和容纳状况。在封建时代，地区人口数量的多少，代表着该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强弱，也就相应标志着当地开发程度的高低。云南、广西的人口数量，据清朝官方的统计数字，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时分别为185,865丁和206,104丁③，约计90余万和100余万人；然而时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云南、广西的人口数量已分别是449万余和742万余人④，各是康熙末年的5倍和7倍。而且，这类官方统计数字多不包括土著"夷户"和来自内地尚未长久定居的"流民"，尤其是乾嘉年间在滇桂边远地方的深山密林中从事垦植和采矿的流民，为数甚巨，清朝官方不愿意也不可能对此进行确切的调查统计，因此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增长数量还要大得多。更加需要注意的是，此期内二省人口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不是在齐同内地的腹里地带，而大多是在昔日被视作"烟瘴蛮荒"的边远山区。这一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着清代滇桂边远山区的开发业绩。

譬如，桂西的太平、庆远二府在康熙末年仅各有人口约2.24万和3.60万人，但嘉庆末年竟分别增至30.15万和48.86万人⑤，亦即各是原来的15倍和14倍左右。又，据认为桂西北地区的宜山、河池、思恩、天河等县，从雍正初年到光绪三十年（1904），其人口各增长105倍、40倍、115倍，甚而至于350倍⑥。如此迅猛的人口增长速度在当时广西的东部地区以至内地各省，都是万难见到的。其原因只能是传统开发区的人口增加多属原有人口的自然增殖，速度较为缓慢，而从前地广人稀的边远山区在清代前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则可以大量容纳来自内地各省以及本省东部的移民人口，遂导致其人口数量的骤然剧增。边远山区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有力地改变了前此该省东西部间人口分布的极不均衡现象，同时也标志着西部地区的开发事实。

清初，云南人口的分布状况也是畸轻畸重。当时滇省的绝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滇池、洱海一带及其附近少数坝区，而在周边广大山区，大抵只有"向未编丁"的极少数量的土著少数民族而已。但雍正以后云南人口分布的变化亦如广西一样，边远山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显著超过腹里地带的同一速度，改变了前此人口极度稀疏的局面。例如地处滇西北的丽江府，康熙末年只有编户人口1.15万人，时至嘉庆末年已有31.74万人，激增近30倍，而同一时期的昆明、大理、临安等腹里各府，至多仅增长为原来的7倍⑦。至于这时的滇东北、滇南和滇东南即东川、昭通、元江、普洱、广南、开化各府所辖地面，更是汹涌而来的流民们从事采矿、垦植活动的主要场所，聚集在这里的流民数量之大，以至清朝官私文献中多用"数十万"、"数百万"甚或"数千万"的说法以形容之。如此众多的移民，其作为边远山区的开发动力，从而显著地改变这里荒凉沉寂的闭塞落后状态，当是显而易见的道理。限于篇幅，这里仅以滇东北地方为例对移民们这种开发业绩略加说明：

滇东北的东川、昭通地方，在明代和清初时尚属四川管辖，然而"蜀道三千，鞭不及腹"，名隶川省，实同瓯脱。长期以来仅有少量彝族人口分布其间，而土司称强，横行霸

道，又严重阻碍着内地人民的自行流入。因此，康熙年间这里仍是一个极度沉寂闭塞的地区。但自从雍正间把这一地方就近划归滇省治理，同时进行改土归流，继而东川铜矿之名大震，各省流民蜂拥而至，这里遂成为乾嘉时期气势宏大的滇铜采冶业主要生产基地，一变而为滇省发达之区。据说当时的东川府地面，“聚楚、吴、蜀、秦、滇、黔各民，五方杂聚，百物竞流”⑧，发达程度可与滇池、洱海一带传统开发区相媲美。如所知道，今日滇东北的东川、昭通二城市早经属于云南省内人口稠密、经济兴盛的繁华都会之列，但追本溯源，它们所以发展的来由，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清代乾嘉年间大规模经济开发的结果。

## （三）

如上所述，清代广西一省以丰裕的粮食生产作为其经济开发的主要特色。其中广西东部由于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早在清代以前就是传统的稻作农业区。乾隆初年以后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多，虽然粮食消费亦相应增大，但因为可以投入更多劳力精耕细作，提高单产，且可辟展耕地面积，所以清代广西的稻谷产量总是自给有余，以至成为相邻之广东省的稻米补给主要来源。地处沿海的广东省，农业自然条件虽优于广西，在有清一代却因人口众多，商品经济发达，农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比重较大，致使食粮需求不能自给，多依赖广西的剩余米谷以为接济，清朝官方文献中有“广东地广人稠，专仰给于广西之米”的说法⑨。乾隆中叶以前，每年输往广东的剩余米谷，均由民间商贾经营贩运，此后官府为防止商贩囤积垄断，确保广东的粮食需要，又于梧州、桂林、浔州、平乐四府专设“备东谷”一项仓贮，每年入库总数10万石，以供广东方面派船前来领运。关于清代广西历年输往广东的稻米数量，除去该项官设仓贮因有明文记载而可知其梗概以外，其余经由民间商人之手者又不知凡几。据认为，在民国初年以前，经由梧州输出广东的稻谷数量，每年都在400万石以上⑩。由此足见清代广西粮食种植业的发达，充分体现着其农业开发的巨大成就。

不仅如此，清代广西的农业开发成就更主要是从西部旱作区的垦植业反映出来。上文指出，雍正以后广西人口迅猛增加的地方是在西部边远山区，在百余年时间内这里的人口竟有以十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增长者。这样大的人口增长速度，必然以相应的粮食产量的增加为前提条件。而当时东部地区的剩余米谷多是输往广东，很少可能被用于支援西部山区这些自发而来的流民们。因此，其粮食产量的迅速提高，只能是移民们为了谋求生存在深山峡谷间寻觅垦辟宜农荒地，种植苞谷、甘薯等旱地作物的结果。

云南全省四处耸山峻岭，可耕地面积十分狭小，加之交通不便没有外省接济可以依赖，所以该省在清代常有粮食不足之苦。乾嘉时期大批的内地流民涌入云南，使粮食困难状况更形严重。然而，当时却极少饥荒现象见诸于记载，充其量不过是有时市场粮价有所浮动罢了。其原因在于，内地来滇的移民中相当大一部分如同上述桂省西部山区的流民一样，是在荒山野岭间通过零星垦植河谷坡地收获粮食，达到自我养活目的；倘若再有剩余，自可出售给那些同样在这里从事采矿等行业的流民们。可以说云南的山区农业，正是在这一时期才获得了成果显著的开发，从而为日后的继续开发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清代滇省的农业开发因为自然环境的限制给人以步履维艰之感，不像广西那样在粮食种植业方面有突出业绩可观，那么，该省却因为地质构造多矿藏，藉此得天独厚之利，加上当时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清政府的扶植政策，而在矿业开发上独树一帜。其中，乾嘉年间

规模恢宏的滇铜采冶业，其成就之巨大，时人有所谓“震古烁今”的评价。在从乾隆初年到嘉庆中叶的近百年时间里，云南的铜料产量每年多在千万斤以上，供给北京户工二部和全国十余省份的铸币用料，成为清朝财政金融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当时云南的其他一切经济开发活动，几乎都是直接受到蓬勃兴旺的采矿业的推动，从而取得各自成绩的。譬如在流入云南边远山区的大批移民中很多是为采矿之利吸引而来，既有穷苦百姓，也有富商大贾，他们给这里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人力和财力资源；为了满足采矿业的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的需要，为了对采矿所需生产用品诸如排水器械、照明灯油以及攻凿、冶炼需用工具提供服务，遂使垦植、手工和商业等都获得一定的发展。其中尤以清政府出于运铜需要在开发云南交通方面所作努力更是引人注目（详下文）。所以，清代前期以铜矿采冶为主的云南矿业开发，不但是当时云南经济开发的重心，而且是主导其他经济开发事业的动力。

事物有盛则有衰，轰轰烈烈的云南铜矿采冶业，从乾隆中叶以后已转入其衰落阶段，道光时便呈现全面衰落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矿业生产自然法则的作用。因为从矿产地质构造看，任何一个地区的某种矿藏，其贮量都有一定限度，并非可以无限采掘而不枯竭。清代云南铜矿各主要产区经过长时期空前规模的大量开采，铜矿贮量不断减少，当是不言而喻的道理。而当时土法开采的生产能力又不能把全部贮量挖掘净尽，更促成所谓“硐老山空”以至生产难以为继的局面。㊂咸同间云南又经过十八年战火，旧有矿山毁坏殆尽，晚清时代的滇铜采冶成就便愈益无足可观，但这时以个旧锡矿业为代表的其他采矿活动却如异军突起，取铜矿之“巨擘”地位而代之，使云南的矿业开发保持了在曲折中的向前发展。清代前期“震古烁今”的滇铜采冶业尽管不可避免地由盛转衰，但是它在西南边疆开发史上所具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

交通是地区社会经济开发的一个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开发本身的一个主要方面。如上所述，滇桂二省自然地理上的最大特征是山地面积广大，这样的地理环境普遍造成陆路交通的困难。然而在水路交通条件上二省却存在很大差异。广西境内江河如织，四通八达。除去流经桂西北丛山中的红水河上游河段以外，其余穿行于边远群山间如左、右二江等江流的主要河段，大都可以通航。至于桂东南由于地处从北部和西部呈向心状汇集而来的诸多河流的下游平原，江面愈加开阔平缓，大型运输船舶可以往来自如，极富航运之利。然而云南却是“自古不通舟楫”，唯赖陆路交通，这种陆路交通在古代又以山路崎岖和人负马驮为其特色。所以，清代云南交通的困难程度和开发交通的迫切性都远在广西之上。而这一开发也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因为篇幅有限，这里仅举金沙江水路开发问题一例：如所知道，水路运输是近代化交通工具问世之前最为强有力的交通运输手段。云南境内虽然不乏金沙、澜沧等名流巨川，但都是奔腾倾泻于深谷幽峡之中，绝少航运条件。乾嘉年间滇铜产量大旺，清政府为解决铜料京运问题，筹思开发金沙江水路以通长江航道。金沙江自青藏高原奔泻而下，蜿蜒行走于滇川边界，“亘古以来未曾通航”。乾隆初年，在云贵总督张久随的主持下，在上自东川小江口、下至四川叙州（今宜宾）一段长达1,300余里的河道上，进行了历时6年、耗资10万两的开凿金沙江航道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从事开凿的劳动人民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由于当时没有工程爆破技术，在破除险滩时只能采用原始而古老的火烧攻凿法；在凿削江岸纤路时，“皆于石罅插木搭架，工匠用藤缠腰，悬空铲凿”⑫。可以说，这正是清代各族人民开发云南交通的生动写照。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这一金江水路工程没有取得完全成功，仅使永善县黄草坪以下可以通航，但是，这一宏大工程本身的意义却远远超出其实际

成就，应该在云南交通开发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

滇桂地区在乾嘉年间获得了成绩斐然的开发，其所以如此，根本一点是“康乾盛世”下安定统一的政治环境使内地充裕的人力资源得以被用于这里的边远山区。然而时至近代，情况却全然不同。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西南边疆的领土主权和自然资源均遭他人肆行侵害，经济开发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保障和前提。在国内方面，由于清朝统治者对反抗其腐朽统治的咸同年间农民大起义的军事镇压，使滇桂二省在长达十八年时间内饱受战火洗礼，其结果是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直至清朝覆亡也未能从这种局面中完全恢复过来。因此，晚清时期的滇桂地区经济开发活动，从总体上说是陷于一种停滞的状态，没有显著成绩可言。但是，事物都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近代滇桂地区的社会经济因为在客观上被注入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预示着对传统开发手段的突破，在这个意义上，其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开发事业又是继续向前发展的。

---

①毛奇龄《蛮司志》卷八。

②魏源《圣武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

③、④见《嘉庆重修一统志》，云南，广西部，“统部，户口”。

⑤、同上书，广西部，“太平府”、“庆远府”。

⑥见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页278。

⑦，同⑤，云南部，“丽江府”等。

⑧、崔乃镛《东川府地震纪事》。

⑨（嘉庆）《广西通志》卷首。

⑩张辰先《广西经济地理》，桂林，1941。

⑪参见拙作“评清代云南的“官治铜政，”《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3期。

⑫《清高宗实录》卷225，页31；卷219，页26。